

姜伯勤 著

敦煌吐鲁番文书 与丝绸之路

文物出版社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姜伯勤 著

文物出版社

(京)新登字 056 号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编辑 蔡 敏

敦煌吐蕃文书与丝绸之路

姜伯勤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汇丰激光照排公司排版

顺义向阳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1

1994 年 2 月第一版 199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0714-4/K · 301 定价 10.00 元

目 录

缘 起	(1)
第一章 拜占廷通往敦煌吐鲁番之路	(6)
第一节 吐鲁番所出拜占廷“金钱”与敦煌文书 所见的拜占廷	(7)
一 吐鲁番所出拜占廷“金钱”	(7)
二 敦煌文书所见的拜占廷	(13)
第二节 阿兰所出汉文文书与拜占廷—北高加索 通往敦煌吐鲁番之路	(16)
第三节 敦煌本慧超行记所见的通往大小拂临 之路	(22)
第二章 波斯通往敦煌吐鲁番的“白银之路” ..	(29)
第一节 萨珊波斯通往高昌的“白银之路”	(29)
第二节 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波斯军”	(37)
一 “波斯军”的性质与“波斯军使”	(38)
二 “波斯道”、“行军”与“差兵”	(45)
三 “送波斯王”与“安抚大食使”	(49)
第三节 在敦煌的“波斯使主”与敦煌文献中 所见穆斯林波斯	(50)

一	在敦煌的“波斯使主”	(50)
二	敦煌文献中所见的穆斯林波斯	(54)
第四节	在沙州的“波斯僧”与波斯文化	(57)
一	在沙州的“波斯僧”	(57)
二	敦煌所见星占与波斯星占	(59)
三	敦煌服饰与波斯服饰	(63)
四	敦煌与发自波斯的“香药之路”、“珠宝之路” 与“琉璃之路”	(64)
五	波斯马具装铠与波斯马毯的东渐	(69)
第五节	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的“波斯锦”	(71)

第三章 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突厥人 ... (83)

第一节	高昌麴朝与东西突厥	(84)
一	突厥在高昌麴朝任命吐屯发的意义	(84)
二	阿波可汗与麴氏高昌	(91)
三	西突厥泥利可汗、处罗可汗与麴氏高昌	(92)
四	高昌麴朝与伊吾吐屯设	(95)
五	欲谷设与麴氏高昌的联合及其对焉耆的战争	(96)
第二节	高昌文书所见的铁勒人	(105)
一	来自伏尔加河和土拉河的铁勒客使	(106)
二	高昌对鸡弊零(契弊)的义务及与栈头(薛延陀)的关系	(109)
第三节	突骑施与唐西州间的金帛马驼贸易	(113)
一	西州都督府市突骑施马文书的历史背景	(114)
二	金帛马驼贸易对突骑施货币流通的影响	(120)

三 “天可汗”西方屏障的失落与丝路形势的变迁	(123)
------------------------------	-------

第四章 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药之路与

法宝之路	(130)
第一节 天竺之路与香药文化	(130)
第二节 健陀罗的香药市场与敦煌吐鲁番的香药市场	(137)
第三节 吐鲁番与敦煌所见的天竺人	(141)
第四节 大食人在中亚崛起后通往印度的法宝之路	(143)

第五章 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150)

第一节 敦煌吐鲁番所见的两类粟特人	(154)
一 麹氏高昌著籍粟特人与唐西州粟特人聚落	(154)
二 麹氏高昌及唐西州未入籍粟特“商胡”	(174)
三 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与两类粟特人	(189)
四 敦煌吐鲁番两地两类粟特人状况的比较	(197)
第二节 敦煌吐鲁番的流通经济与“白银之路”上的粟特人	(198)
一 7世纪前敦煌吐鲁番地区与粟特地区的银币流通	(199)
二 7世纪粟特的铜币流通与敦煌吐鲁番铜币流通的关系	(202)
第三节 敦煌吐鲁番所见的“胡锦”与粟特锦…	(206)

一	敦煌文书所见的“胡锦”、 “番锦”和“毛锦”	(206)
二	“胡锦”、“番锦”与“赞丹尼奇锦”	(211)
三	汉地生产的胡式锦与粟特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217)
四	胡锦输往敦煌、吐鲁番、阿兰与欧洲	(223)
第四节	高昌敦煌的萨宝制度与胡袄祠	(226)
一	高昌“萨薄”与敦煌“萨保”	(227)
二	高昌“阿摩”、“胡天”与唐西州“胡袄”	(235)
三	论敦煌袄寺与神主	(243)
四	论敦煌赛袄	(254)
后 论		(264)
西文参考文献举要		(273)

缘 起

本书的写作，缘自马雍先生（1931～1985 年）对作者的教诲。

天资聪颖的马雍先生，对中国中亚史研究和高昌文书研究倾注了如火的热情，使我深受感染。1978 年末，因为一种机缘，我幸运地在唐长孺先生主持的文物局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忝陪末座，揭开了我终生难忘的一页学徒生活，并得以向小组中的马雍先生朝夕请益。

一天，马雍先生兴奋地说：中国学者将来总要编一本多卷本的中亚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就有丝绸之路史料，好好研究，对将来编书一定有用。他嘱咐我在研究敦煌文书和学习整理吐鲁番文书时，把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找出来研究、备用。

在其后四年中，虽然马雍先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但我却遵嘱抄录了盈匣的文书。1984 年樱花时节，又是因为一种机缘，我有幸得读池田温先生早年发表的《8 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①一文，深受启迪。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期间，在池田先生启发下，由是，对丝绸之路的真

① 池田温：《8 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大陆文化研究》，1，北海道大学，1965 年。

情与奥秘进行了良久的思考，而这时所亟欲探明的问题，则正是池田先生为作者点破的“东西方贸易的担当者”^①这一课题。

原来，中世纪的东西方贸易，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市场形成并具有国际金融体制的近现代东西方贸易的历史现象。中世纪早期的东西方贸易，是由特殊的“商业民族”担当的。马克思早已提出“商业民族”这一概念，并且指出：“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转运贸易的垄断者——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在中世纪中的情形一样。”^②作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人在中国一侧的东西方贸易中扮演的角色，犹如作为“商业民族”的犹太人在地中海、北海远程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往往以一种特殊的宗教纽带、聚居形式生活在中世纪世界的缝隙中。

4至8世纪的吐鲁番文书和5至11世纪的敦煌文书，使我们重新发现并认识粟特人作为“商业民族”、作为队商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真情实景，看到了与之相关的拜占廷与波斯两个大国在丝路贸易上的利益冲突，也看到了粟特人与草原民族西突厥人、铁勒人、突骑施人在丝路利益上的相互依傍，并看到与粟特人相关的中国丝绸市场的各种历史相。

中古丝绸贸易的一大奥秘还在于，丝绸这种商品，它不

① 池田温先生为拙稿《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所写跋文，《东西交涉》，第5卷1号，1986年3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5～49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仅是一种货币的等价物，也是一种价值尺度，而它本身也一度是一种货币。唐代“钱帛兼行”，绢帛往往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1986年1月，在法国文坛享有盛名的盛成教授，回到他早年工作过的中山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丝绸之路》的演讲。盛成教授20年代在巴黎大学讲授过“比较蚕桑学”。他于1986年1月28日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金融史上的“丝本位”说。他说：

丝绸之路上有许多丝都。中国的长安可以称为丝都。意大利的佛洛伦萨在中世纪是一大城市，也可以称为丝都。但丁的时代有人因丝库无丝而遭到放逐。法国路易十四想把杜尔也作为丝都，然后推广路易十四的丝绸文化。丝都有丝库。丝库的丝作为黄金一样来保值。历史上有金本位，也有丝本位。

盛成教授的“丝本位”说极富启发性。启发我们从金融和国际金融的角度来观察丝路贸易。研究东西方贸易的学者早已关注在昂贵的丝绸贸易中，东西方贸易如何平衡的问题。而吐鲁番、敦煌文书及出土物，表明4至7世纪，在凉州即武威以西，包括敦煌、吐鲁番，曾经存在一个允许流行西域通货的货币特区。拜占廷“金钱”、萨珊波斯“银钱”及粟特“银钱”的流入，不但反映了中国在丝路贸易中的“出超”态势，也折射出两汉至盛唐中国丰厚的国力。

科学的研究和常识的判断常常大相径庭。从常识出发，中国既然是丝之国，那么，说中世纪丝织工艺的发展，也就容易忽略中国以外的发展。吐鲁番文书中的“波斯锦”和敦煌文书中的“胡锦”的记载，以及两地联珠对兽型纹样织锦的

发现，却使我们不能不以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来面对这些事实。在本书写作中，我反复学习和研读了夏鼐先生《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综述中国的萨珊朝银币》等著作，以及在日本所作关于丝绸之路的演讲。我深深感到这些大著对于我辈后学是具有经典性的。夏鼐先生的文章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与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既没有半殖民地的奴颜媚骨，也没有积重难返的前近代的“天朝”心态。本书在考察这些问题时，力图以夏鼐先生的科学态度作为榜样。

自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创说“丝绸之路”这一术语以来，国际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我国自清季“西北地理”学派的辉煌开拓以来，著述亦不胜枚举。以致我们在导言中作一研究史的回顾，也决非易事。因此，有关文献的回顾分列于正文各章。

本书以部分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的研究为中心，探讨与“东西方贸易担当者”有关的丝路实况，旁及“白银之路”及“香药之路”。本书采用的方法是陈寅恪先生倡说的“二重证据法”，具体办法是以出土文书与其他考古发现相参证，以地下出土物与史籍相参证。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多少作一点中史与西史的参证。本书不是对丝绸之路历史的面面俱到的解说，而只是以一部分有关文书资料和部分考古发现为骨架的二重参证的研究记录。

在1972年夏天的艰难岁月里，我曾去中华书局二十五史组拜谒唐长孺先生。唐先生那时以一种高瞻远瞩的目光展望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唐先生说：研究文书是为了在重

大问题的认识上取得突破。自那时以来，我们一直以此为鞭策，不敢稍有懈怠。只是限于学力，所能取得的认识还远远达不到前辈的要求。只能说，这份不懈的努力，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伟大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一份爱心。

本稿资料准备工作凡4年，而属稿及修改又历时7年。近10年来本稿得以完成和出版，应该感激文物出版社的帮助和支持。本课题研究的后期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科学规划项目基金资助，谨致谢忱。在此，我更期待着读者严正的批评。

本稿出版又蒙广东省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再三多谢当年建议这一选题构想的李力女士等各位人士。

在本稿付印过程中，荣新江先生的指教帮我避免了若干疏误，蔡敏先生严谨的编辑工作也帮我改正了好些疏失，再一次感谢他们的好意。

第一章 拜占廷通往敦煌吐鲁番之路

7世纪初，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三卷，这是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丝路世界”认识的煌煌大著。这部已佚著作的《序》幸得保存，它确切地指出了敦煌在东西丝路上的“咽喉”地位，并记载了敦煌通往“拂菻国”亦即拜占廷的道路。

《隋书·裴矩传》引《西域图记·序》云：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拨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1903年，法国学者沙畹在俄国圣彼得堡又出版了《西突厥史料》一书。书中把拜占廷史料、波斯史料与汉文史料加以对照，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这一“丝路世界”的贸易实况。沙畹说，“中国之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一重要商业，其商道有

二，其一最古，为出康居（Sogdiane）之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而以婆卢羯訖（Broach）为要港。当时之顾客，要为罗马人与波斯人，而居间贩卖者，乃中亚之游牧，与印度之舟航也”，又谓“当时在西亚贸迁丝物者，要以康居人为众”^①。这里所说的康居即粟特，罗马东部即拜占廷。

本世纪以来陆续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分别出自当日东方丝路的“咽喉”（敦煌）和“门户”（高昌），这些文书给裴矩的记载及沙畹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并引发了若干新问题。我们的讨论从敦煌通往拜占廷之路开始。

第一节 吐鲁番所出拜占廷“金钱” 与敦煌文书所见的拜占廷

一 吐鲁番所出拜占廷“金钱”

公元330年（东晋咸和五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拜占廷地方建立新都，此即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

拜占廷即东罗马帝国，以拂菻、蒲林、普岚等名称见知于东晋及南北朝时期的史籍。在吐鲁番地区墓葬中，发现了5至6世纪拜占廷金币，证实了高昌地区与拂菻的历史联系。

1915年，斯坦因在阿斯塔那i:3、i:5、i:6等三处墓葬中，发现了3枚“拜占廷金币或此种金币的仿制品”，经R. B. Whitehead考证，为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金币的

^①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第208～209页，中华书局，1958年。

约略相同时期的仿制品^①。这些薄的金币发现于墓葬中死者的口中。据斯坦因说，古代希腊有把钱币放在死者两唇间的习惯，而沙畹在1916年也提出，在汉文大藏经的一个佛教故事中，暗示出此种习惯并不为远东人所知。另外，1914年在新疆和田地方发现了4至6世纪拜占廷金币，计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us I 337~340）、君士坦（Constas 337~350）、狄奥多西（Theodosius 379~395）、查士丁（Justinus 518~527）等金币各1枚^②。

1966至1969年，新疆博物馆在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墓葬发掘中，又发现了东罗马金币及仿东罗马金币，这些金币发现时亦含在死者口中^③。

拜占廷金币在中国史书及吐鲁番文书中称为“金钱”。

如《晋书·四夷传》记大秦“银钱十当金钱一”。大秦是中国史书中对罗马的古称。此条当袭自《后汉书·西域传》，有谓“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实际上，在世纪初，罗马金币是一种通行甚广的标准货币，印度人公元1世纪的金币亦与罗马金币共重量，“当十”一字，在印度文字中亦存之颇久^④。吐鲁番出土拜占廷金币的仿制品，反映了西域以罗马金币、萨珊银币为国际通货的情形，这些金币仿制品不一

① A. 斯坦因：《亚洲腹地》，第二卷，第646页；第四卷，图版120，15、16、17号；第三卷，附录B，第993~994页，伦敦，1928年。

②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三国—宋元考古（上）》，第136页，1974年。

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期。

④ 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2页，海洋出版社，1984年。

定来自拜占廷人，而可能来自中亚队商。

但吐鲁番出土拜占廷金币中亦有非仿制品，且出土物多集中在 6 世纪查士丁一世及查士丁尼一世^① 诸朝时期的麴氏高昌墓葬中。这种情况决不是偶然的。

原来，早在 586 年之前，有一粟特使臣摩尼亚赫（Maniach）使于波斯王库思老处^②。据皮古列夫斯卡娅研究，Maniach 这个名字意为 Mani 与 ah（叙利亚语：兄弟），意即“摩尼兄弟”^③。当为景仰摩尼教创立者的意思。公元 568 年，拜占廷皇帝遣摩尼亚赫返回粟特，并前往西突厥室点密可汗的驻所。这就是说，6 世纪后半期，拜占廷与西突厥间，以粟特人为中介，经黑海及外高加索有频繁的通使关系。而吐鲁番地区的高昌麴氏与西突厥有密切的联系。这样，拜占廷金币很自然地就通过粟特人、拜占廷往西突厥的使臣及西突厥人之手，辗转地流入了吐鲁番地区。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吐鲁番所出大谷文书中，有一件为上述流播途径提供了有力证据。大谷一〇四〇号文书背面，有《高昌年次未详（6 世纪后期或 7 世纪前期）头六拙等书信信物入历》^④，内容为：

① A. 斯坦因：《亚洲腹地》，第四卷，图版 120 所刊拜占廷金币，如前已述被认为是查士丁一世金币仿制物。但皮古列夫斯卡娅在《拜占廷通往印度之路》（俄文版）第 201 页谓：“在阿斯塔那两墓发现的仿金币，一为查士丁一世（518～527 年）者，另一为查士丁尼（527～565 年）者。”（注：斯坦因前掲书图版 120）

②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第 209～211 页。

③ 皮古列夫斯卡娅：《拜占廷通往印度之路》，第 202 页，莫斯科，1951 年。

④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 331 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 年。

1. 头六拙书后作王信金钱一文。
2. 迦匕贪旱大官作可顿信金钱一文，作王信青马一疋、书一酖、绫二疊三。
3. 酒一駝（驮）、面六斛、床半六斛、面六斛。

按古代寄送书信，随信附有信物。且有以珍贵的外来金币作信物的习惯。如吐鲁番阿斯塔那5号墓所出《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三》^①中有“[图]绍贞将信金钱二文[图]问语阿兄”，此件为贞观廿一年（647年）后、总章元年（668年）由洛州写回西州的信件，其中亦以“金钱”为信物。上引大谷一〇四〇号文书中，“头六拙”即西突厥“咄陆设”，或即乙毗咄陆可汗，又名欲谷设（详细考证见第三章第一节），在高昌麹朝末期及唐贞观平高昌前，与高昌政权在军事上结盟，其信件则附有“金钱一文”作为信物。另有“金钱一文”是珂顿（可敦）即可汗妻的信物。此件文书证实了6至7世纪由西突厥汗庭将金钱——且极可能是拜占廷金币携往高昌。

拜占廷金钱在高昌地区可以作为一种信物，也可以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的标准货币。在人死后的虚幻世界里，拜占廷金钱是一种葬仪的道具，也是随葬衣物疏中祈求冥福而加以虚构的冥财的内容。从吐鲁番出土大量随葬衣物疏中，我们看见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以“金钱”为虚构的随葬物，只

①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第396页，文物出版社。本书所引文书主要引自《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至第十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1991年出版。以下只注明册数及页数。原文书异体字、别字、草体字较多，引用时凡不产生歧义处，皆改用通行简化字，不另作说明。